

往事如昨

## 老屋记

崔永文

胶东的风，带着海的咸涩，吹过老屋的土坯墙，一如父亲粗糙的手掌，抚过我半生的记忆。

那五间老屋，是我生命的襁褓，是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起熬日子的窝。小时候家里穷，灶膛的火似乎不曾熄灭，可锅里煮的，永远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地瓜汤。我们姐弟六个，像六棵挤在田埂上的小苗，是父母用自己的骨血，把我们一寸寸托向阳光。

老辈常说：地瓜饼子、咸菜梗子，不吃就挺着。穷日子里，哪有什么挑挑拣拣，能啃上一块带着焦壳的地瓜饼子，就一根咸得发苦的咸菜梗子，就算是顶好的饭食。母亲守着锅台，一辈子喝的是清汤寡水，饼子从来轮不到她沾边；父亲下田出力，能分到半块玉米饼子，他常常省下来，掰成六小块，塞给我们姐弟。

有一个镜头，我至今想起仍心酸得止不住流泪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忘不掉——

漆黑漆黑的夜里，推粪要推到深夜。只有一丝微弱的月光，照着上山的小路。父亲推着沉重的粪车，两边筐子装得满满当当，压得他腰都快折了。前面是我哥、我姐，脖子上勒着绳子，身子拼命往前倾，一步一挪，一步一颤，像苦力、像骡马一样，在昏暗的月光下苦苦挣扎。

一辆二八自行车，车梁上焊着铁架，能驮起二三百斤的甜瓜，也能驮起我整个童年。三十里的土路，坑洼不平，父亲一个人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步一步，推上足有二三里的葛沟大陡坡。他紧紧弓着背，汗水浸透的粗布褂子贴在背上，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。

到了县城的白洋河集市，他把瓜筐往地上一放，就成了一个不太会吆喝的商贩。遇着雨天，集市散了，卖不了的瓜果，他就挨家挨户敲门推销。我坐在车梁上，看他陪着笑，看人家摆手关门，看他把瓜往怀里轻抱，像护着一家八口活下去的指望。

散集后买的那个猪肉包子，他从不舍得咬一口，只是看我吃得满嘴流油，便眼睛弯成了月牙，皱纹里盛着笑意。那包子的香，是我后来走遍天下，再也寻不到的味道。

父亲的手，白天在生产队的田里刨食，在荒坡上推粪、刨地，泥土嵌进指甲缝。他的手掌，老茧如石头般坚硬，老茧之外，是密密麻麻的裂口，像老屋墙根下皸裂的土。

父亲爱开荒，他用这双粗糙的手，将村外的荒坡一镐一镐刨成了良田。杏子大的小石头，被捡得干干净净，堆成垛，垒到地堰上。地里的土，被筛得细细的，连草根都不肯放过。田埂修得笔直，像他做人的规矩。他总说，地是有良心的，你对它好，它就对你实诚。

在六个孩子里，父亲最疼的，

就是我。他总爱轻轻唤我的乳名：华勇，华勇……逢人便笑着说：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俺华勇将来，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。可惜那时我小，听不懂父亲话里的期盼。

当我开始做生意时，父亲也渐渐老了，于是我每个礼拜都往老屋跑。父亲这辈子，最爱吃的就是一口小咸鱼。我每次回去，都买上几条小咸鱼，打上一壶酒。一到晚上，爷俩就坐在老屋里，从傍晚六点，一喝就能喝到深夜。父亲跟我絮叨最多的，是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买卖，一遍又一遍传授他卖菜的技巧。

听说在那个飘雪的冬日，父亲是吃了最后一点小咸鱼，抿了最后一口老白干才上路的。他推着那辆老自行车，走进了风雪里，说去赶个早集。他虽然老了，却不想给儿女添任何负担，他自食其力。那天的雪埋了父亲的脚印，也埋了他没说出口的牵挂。街坊说，他为了多挣那几毛钱，抄了近路，那路是被雪盖着的断崖。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我的老父亲，他受的罪、吃的苦，是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。我年纪越大，越明白父亲的伟大。他不是神，却用一副肉体凡胎，为我们姐弟六人，撑起了一整片天。我把父亲的照片洗成大大的遗像，挂在老屋的镜框里。相片里，他用那样慈祥、欣慰、高兴的目光看着我，那目光，如山一样厚重。

父亲走了，母亲也走了。老屋的门，我总舍不得锁。每次推开那扇门，心里又酸又甜，从前习以为常的点点滴滴，如今目之所及皆是回忆。院里的每一棵草、每一棵树，屋里的每一件老物件、每一块石头，我都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仿佛父母从未走远，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昨天。

我已年过半百，在外打拼满身疲惫、心力交瘁的时候，仍会不顾一切回到老屋，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所有的累、所有的难、所有的委屈，一踏进老屋的门，便烟消云散。老屋的土炕，是这世上最硬、也最舒服的床，每次躺在炕上，仿佛总能听见爹妈还在堂屋里忙活。往土炕上一躺，身子贴着熟悉的温度，闻着烟火与泥土的气息，那种踏实、那种安稳、那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舒服，是任何豪华大床都比不了的。

每次回老屋，我都把父亲的遗像擦得锃亮，再摆上包子，摆上小咸鱼，摆上老白干，还有一块地瓜饼子、一碟咸菜梗子。就像从前的日子一样，他似乎就在眼前，在等着我喊一声“爹”。

很多人找上门，三番五次想买我的老屋，都被我婉言谢绝。对我来说，这老屋是千金不换的，它是我的根、我的魂，是我一辈子要守住的家。

## 换油路上

孙龙义

大集体时期，每年秋收过后，各生产队都会把晒干扬净的花生作为油料，按人口分给各家。分得油料后，各家各户都会抓紧时间把花生去壳拣净，争取在严寒季节到来之前，到油坊去换回花生油。

说起油坊换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发生在换油路上的那些故事。

当时，离我们村最近的油坊，在整整二十里地外的姜格庄村。这二十里地，虽然不算太远，但要翻山过岭，路面坑洼不平，行走起来确实不方便。每年到姜格庄油坊换油，村里人都会拉帮结伙，推着独轮小车，挑着准备盛油的铁桶，不畏艰辛地步行到姜格庄村。

有一年，我和信东叔结伙去换油。当时，我用独轮小车推着花生饼，信东叔则用担杖挑着两只水桶，水桶里分别装着我们两家的花生油。在过一条小沟渠时，一个不小心，前面那只油桶碰到了路边的石块上。这一碰一晃，桶里的花生油竟有一点儿洒到了路面上。信东叔“啊呀”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洒到路面上的那点儿花生油，刚好集中在一个驴蹄坑里。信东叔二话没说，立即放下肩上的担子，顺势蹲下身来，伸出手指把驴蹄坑里的花生油抹起来，然后把手指伸到嘴里，用舌头把手指上的花生油舔得干干净净。如此这般地反复了好几次，驴蹄坑里的那点儿花生油基本让他舔干净了。但他还没停手，竟然把驴蹄坑里还带着油湿气的泥土抠出来，放到手帕里包好，装到衣兜里。我问他这是干什么，他说带回家喂鸡，让鸡也尝尝花生油的味道。回到村里以后，我把这事儿说给村里人听，村里人都笑得直不起腰。

说起换油路上的笑话，我村潘永学大叔也闹出过一次。直到现在，村里人凑到一起说起这段故事，还会笑个不停。

有一年秋后，永学大叔挑着油料到姜格庄油坊去换油，回来时挑着油桶和花生饼，吱吱扭扭往家赶。离家还有一二里路的时候，他忽感尿急，本想找地方方便一下，但一想到自家茅房里积攒的人粪尿生产队按斤数计工分，就决定坚持一下。于是，他努力憋住，走到家门口时实在憋不住了，一进门便把担子放到地上，一头钻进茅房里。他正尿得起劲儿，猛听得院子里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：天哪！只见一群小猪崽儿正围在油桶四周，呱呱呱呱地抢喝油桶里的花生油……只为一泡尿，丢了半桶油，让人忍俊不禁但又感慨万千。

现在想来，老一辈人所谓的“算计”，其实是苦日子精打细算才能细水长流的朴素智慧，隐藏着勤俭节约日子才有奔头的希望。

怀故人

## 福昌叔

孙景璞

我五爷爷家境贫寒。福昌叔是五爷爷的第四个儿子，乳名叫“成”。

平日里，长辈和同辈都直呼其乳名。晚辈们有的叫他“成叔”，有的叫他“四叔”，我就叫他四叔。

福昌叔有点弱智，不识字。他记不住自己的年龄，好心人再三再四地让他记住今年他的岁数。譬如有人问他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他回答：“十八啦。”再问他：“明年呢？”他答曰：“不一定。”看吧，就是这么个水平。

福昌叔虽然弱智，但他忠厚老实，品行端正，不多说话，不惹事。有些小零活，人们常请他帮忙，他从不推辞。他体质较差，田间活基本不能做，只能在家里或者生产队的场院里干些零杂活。譬如，由另一个搭档带着，做些扛扛抬抬的活。他的另一个优点是腿脚勤快，爱干跑腿的活。生产队长常叫他叫人、传话，还真是一个好帮手。那时生产队长照顾他，给他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。在场院里，他是妇女队长的“传令兵”。

我祖母年迈，我年龄小或是在外工作时，母亲经常请他帮做一些事情，他成了我家的一个“编外人员”。

有一次，我母亲让四叔去三间房村叫我三婶回家。三间房村距我村有七八里路，去该村时还要经过前朱石村。“三间房”，顾名思义，村庄不大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。我三婶就住在大街路北，四叔曾经去过几次。这次去，他却忘记了家门。他急中生智，在大街上高声大喊：“三嫂子，三嫂子。”村里不少人出门看究竟。三婶也在家听见了，开门把他迎回家去。幸亏村子小，若是大村子，那可要大费周折了。

四叔有项专利，那就是每年春节村里大办文化活动，还要敲锣打鼓到各村去扭秧歌、演戏剧，四叔是专门背鼓的那个人。年年如此，背鼓的人熟练了，敲鼓的人也得得心应手，真是合作愉快啊！

三叔因病去世后，四叔的生活质量也降低了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失踪了。三天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他的遗体。他的去世，令我悲痛，令我怀念。